

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发展困境及治理路径

——学科制度的视角

宋争辉 王 勇

【摘 要】 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是在学科制度化与学科去制度化的相互博弈过程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学科制度既是构成现代大学组织制度的基础,又是促进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在知识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背景下,学科发展面临着去制度化的压力;学科过度制度化制约传统基层学术组织的变革,给其组织模式和治理机制带来严重挑战。为应对学科制度危机,应从学科理念、学科结构、学科治理、学科文化等方面入手,创新我国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的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回归大学基层学术组织作为人才培养和知识生产的学科属性,着力增强组织治理能力,提升学术创新能力。

【关键词】 学科制度;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治理路径;组织创新

近年来,随着《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的颁布实施和《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的出台,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步入了“深水区”,政策实施和学术探索逐步从扩大办学自主权转向提高大学内部治理能力,逐步从大学的顶层设计转向大学的基层治理。“教育改革不能只依靠顶层设计,必须将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有机而辩证地结合起来。顶层设计容易出现失灵、走样、低效等问题,基层探索是渐进性教育改革成功的关键。”^①作为学科和事业单位交叉汇聚的地方,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是在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学科制度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从学科制度切入,对更好地理解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革和治理模式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在当前知识转型和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治理面临着发展困境。从学校层面到基层组织,几乎全面复制政府的管理模式,导致大学基层学术组织高度体制化、趋同化,缺乏基层探索和治理创新。如何通过改造学科制度,创新我国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的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回归大学基层学术组织作为人才培养和知识生产的学科属性和学术特征,应成为当前我国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提升学术创新能力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宋争辉,管理学博士,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 400715),信阳师范学院教授(信阳 464000);王勇,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重庆 400715)。

①程红艳、周金山:《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教育改革与学校变革关系辨析》,《教育研究与实验》2018年第2期。

一、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治理面临的困境

不同于政府机构和企业组织,大学是传播、生产、应用和管理高深知识的学术组织,具有“松散联结”和“底部沉重”的结构特点。研究大学运行的基本规律,提高大学的组织创新能力,最佳的切入点和最终的落脚点应聚焦大学的核心技术层,即基层学术组织。基层学术组织是在大学纵向结构中具有一定自治权的最低层次的学科组织,主要包括大学的基层教学组织,如系、教研室等和基层研究组织如研究所、研究中心等,承担着具体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功能,在大学组织建设和治理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大学作为政府机构的附属单位存在,缺乏对学科逻辑和社会逻辑的理性把握,致使基层学术组织的学术民主理念淡化和学术自治权缺失,组织趋同现象较为严重。

(一) 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

在知识转型和社会变革的背景下,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在组织定位、治理结构、职能权限和治理机制方面面临发展困境。

1. 组织定位不清。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虽几经变迁,但其发展使命和组织理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突出表现为过于强化行政功能或教学功能或研究功能,忽视了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本质特征即学术性、民主性和结构松散性,难以实现知识传承、创新与应用的有机整合;对于自身到底属于以科层为主的行政组织、以专业为主的教学组织、以学科为主的科研组织,抑或以产业为主的企业组织定位不清。

2. 治理结构失效。我国许多大学没有立足自身的类型、层次、科类特点,缺乏分类管理的理念,在学术组织设置上,遵循“学科目录”式的行政逻辑,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单一化、同质化的发展倾向,如“以《学科目录》为建制依据的基层学术组织多于面向实际问题、以科学研究项目为基础设立的基层学术组织;单一学科的基层学术组织是主体,跨学科的基层学术组织为数较少;成建制、稳定的基层学术组织多于临时的、动态的基层学术组织。”^①由于治理结构失效,学科壁垒丛生、学术资源分散,无法充分提高基层组织的学术生产力。

3. 职能权限虚化。当前我国大学组织制度的许多问题,基本上可以归结为组织权力分配的失衡,而这些职能权限在大学内部层次间、类型间出现的职能漂移和权限错位又都集中于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学校层面几乎牢牢控制着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造成纵向放权不够、横向分权不足,出现了基层自治权力虚无化、学术权力边缘化的现象。

4. 运行机制僵化。在大学运行过程中,治理模式过于单一,过度强调自上而下的科层化的执行机制,忽视了自下而上的反馈和协商机制,以及基层学术组织之间和学者之间缺乏横向互动。制度刚性有余,缺乏平衡扩大民主参与权利和提高治理效率的组织方法,致使基层组织的文化整合机制和治理能力严重弱化,难以保障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学术使命的实现。

(二) 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治理缺乏学科逻辑的支撑

总的来说,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建设和治理机制整体滞后,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不能适应知识创新的要求和学科建设的需要。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没有经过学科组织化与制度化的历史过程,缺乏学科制度的支撑,忽视了学科逻辑的价值引领作用。具体来说:

^①郑晓齐、王旋蕊:《我国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国高教研究》2009年第3期。

一是在文化背景方面,我国自古就有“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传统,没有产生出学术自治、学术自由的文化土壤,使得我国大学学术组织行政化倾向较为严重,偏离了学术本位。二是在历史背景方面,新中国建立以后,特殊社会环境下产生的单位制使我国大学长期隶属于政府部门,并通过“再生产”机制,将行政机构的政治权力、行政权力,自上而下,从政府到大学,从学校层面到基层组织,进行全面复制,导致大学基层学术组织高度体制化、趋同化,缺乏基层探索和学术特色。三是在现实背景方面,我国大学学科建设和院系设置,主要遵循《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研究型大学依据学科门类或学科群建立学院(学部),依据一级学科建立系(教研室)或研究所等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教学研究型大学依据一级学科建立学院(系),依据二级学科建立系(教研室)或研究所等大学基层学术组织。与西方大学基层学术组织设置遵循的学科逻辑不同,我国的学科目录更多体现的是行政管理中的科层倾向和约束功能。

当前,我国正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业已成为支撑创新驱动、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水平和发展水平和区域内高水平大学的学科协同创新能力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面对着科学技术的综合化和知识生产模式的变迁,“尽管跨学科理念与活动已成为社会和大学的热点,但学科作为认知活动中的‘第一原则’和‘构成其他一切的基石’的地位并没有改变。”^①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面临着既要坚持学术逻辑、回归学科取向,又要坚持社会需求逻辑、兼顾跨学科理念的双重使命。

二、学科制度化是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的重要动力

学科是大学的组织细胞,构成了大学组织结构的基本要素。大学基层学术组织与学科制度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学科制作为一种基于学科组织建构起来的学术组织结构、学术运行机制,是大学最基本的学术组织制度,也是现代大学基层组织制度的创新。”^②在学科分化、综合化基础上产生的学科制度化,对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创新和治理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学科制度化是学科分类的关键

学科建设是学术界较为流行的术语和概念,尤其在大学,很多人言必称学科建设。从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到“双一流”建设,无不凸显出学科建设在政策制定和高校实践当中的重要地位。大学作为一种学术组织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其在运作过程中遵循了学科逻辑。高水平大学就是通过学科这一基本的组织形式,集聚大量具有专业技能的知识分子,有效承担了知识传承、知识生产、知识整合与应用等组织职能和社会责任,从而成为支撑创新驱动、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然而,学科建设属于我国特殊的话语体系,在西方并没有相对应的概念。由于其内涵不够明确、外延过于宽泛,不同的主体往往出于自身利益或立场的考虑,对学科建设做出不同的解读和界定,这造成了理论研究的困境以及实践探索的误区,使得“学科建设所蕴涵的智慧启迪的潜能,正慢慢枯竭”。^③在此背景下,学科制度问题随之凸显出来,成为了学科建设领域关注的重点。学科制度化是学科分类的关键,是学科建设高度专门化、成熟化的标志。探讨学科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有助于深化学科内涵和拓展学科外延,对认识大学组织制度和治理结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①钱志刚、崔艳丽:《知识生产视域中的学科制度危机与应对策略》,《中国高教研究》2012年第10期。

^②宣勇、张金福:《学科制:现代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制度的创新》,《教育研究》2007年第2期。

^③韩水法:《学科制度笔谈:大学制度与学科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从学科与知识的关系看,学科是知识分类的体系。在人类历史上知识分类由来已久,但知识的制度化和学科化只是近代以来才发生的事情。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领域都能够堂而皇之地进入到大学组织中,只有符合科学规律和知识内在逻辑,实现了专门化的知识,才能成为学科领域的组成部分。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看,学科是知识分化的产物,也是权力规训的结果。在知识不断制度化和专门化的历史进程中,学科结构日益分化,通过历史上较早出现的书写、评分、考试等教育实践形式,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两种大学职能有机整合,在社会机构,尤其是大学中逐步取得了合法地位。“19 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①学科制度化增强了学科的身份意识、自主意识和边界意识,形成了以知识为中心的“无形学院”和学术共同体,并最终确立为集知识传承、生产和应用等为一体的学科设置、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科评价等制度,其中尤以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制度为重。

（二）学科制度化是大学组织结构和治理制度的基础

学科构成了大学日常运行的基础,成为了组织大学学术活动的基本单位,办大学就是办学科的逻辑已经深入人心。大学在运作过程中,以学科为中心,遵循学科逻辑。从提高管理效率的角度看,学科在大学的制度化,逐步改变了传统学科建设中碎片化的要素投入方式和个体化的劳动方式,使知识生产、传承和应用实现了组织化、科学化和专门化,对大学的专业建设、教育教学、课程标准和评价体系等起到了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在制度化视角下,学科超越了传统的知识分类范畴,成为了集知识分类、组织结构、制度安排和规约机制为一体的制度形态,包括学科理念、学科组织、学科结构、学科治理、学科文化等因素。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关系,共同成为大学组织结构和治理制度的基础。

（三）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是学科制度化的结构形态

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是在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基层的视野中属于学科组织,处于事业单位和学科交叉的大学学术心脏地带,是“传统学术价值观扎根最牢固的地方”^②。在大学的基层,知识以学科为载体,单位以学科为基础,学者以学科为依托,权力以学科为根本,充分体现了大学的学术特质和文化属性。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具有典型的学科属性,与学科制度化存在着密切关联。“在学科制度化的条件下,学科不仅为大学学术活动提供了基本的工作材料,同时也是大学组织教学、科研等活动的基本单位。”^③具体而言,一方面,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是学科制度的物质载体和结构形式,深化了学科制度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学科制度化是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发展的主要动力,促进了大学职能的不断完善和治理结构的变革。作为规约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制度性结构,学科制度化遵循着知识逻辑和学术理念,以学术权力为基础,注重学术文化氛围的营造,致力于实现人才培养的专门化和知识生产的专业化。

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是学科制度化的历史产物。大学之所以能从最初的行会组织演变到后来的学术组织及现代大学机构,学科制度化无疑起着重要作用。中世纪之前,知识还没有完全分化,处于模糊综合化阶段。社会上存在着教授会、同乡会、学舍等组织机构,这些机构并非依据学科设立,要么只提供住宿、要么只讲授文、法、神、医四科学问,学者从教也多属于个体行为,具有行会特点,类似于一种行会组织,学术特征较为淡化。中世纪以后,随着学科制度的逐步形成,知识生产主体逐步从个体

① [美] 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8页。

② [美] 伯顿·R. 克拉克:《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王承绪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页。

③ 伍醒:《从讲座制起源看19世纪大学学科制度化的变革意义》,《中国高教研究》2013年第8期。

行为转向群体组织,知识生产方式逐步从思辨、试错转向科学实验,知识生产过程逐步从模糊综合转向分化和专业化。与此同时,知识实践形式也从教授会、同乡会、学舍转向实验室、课室、研讨班等建制。至此,分门别类地划分知识具有了组织建制的含义。

由于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存在着脱节,这一时期的学院制主要服务于人才培养,与建立在学科基础上的现代学院制有着根本的区别。进入19世纪以后,自然科学知识进入到学科领域,成为大学专门的研究对象,学科制度正式形成。在此基础上,德国讲座制的建立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第一次将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职能在基层学术组织结合起来,实现了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承制度的有机整合,并进一步促进了学科制度的发展。亨利·埃兹科维茨将其称为大学的“第一次学术革命”。此后,美国开创了另外一种影响深远的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即学系,将知识的综合与应用纳入到学科领域,促进了近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壮大和当代创业型大学的异军突起,亨利·埃兹科维茨将其称为大学的“第二次学术革命”。

在几经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大学将学科作为基本组织方式,开展知识传承、生产和应用,有效地承担了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组织功能,回应了社会需求,适应了外部环境的变化,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立足学科不断完善了自身组织结构,逐步走入了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可以说,学科组织化的历史就是学科制度化的历史,而“学科制度化既是近代大学复兴的动力也是其重要的成果。”^①

三、学科制度危机及对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治理提出的挑战

在知识分化的过程中,学科制度通过知识的专门化,对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在由知识分化到综合化过渡的现代社会,学科发展面临着去制度化的压力,制约着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变革,给其发展理念、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带来严峻挑战。

(一) 学科制度面临着合法性危机

造成学科制度合法性危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产业化,即学术资本主义思潮的侵袭、社会对大学绩效考核的强化、大学职能的增加等。其中,知识范式变迁和生产方式的变化是关键因素。面对着知识总量的不断增长和科学技术综合化的趋势,注重专门化和客观化的近代知识生产模式也即“知识生产模式1”变得难以为继,一种超越传统知识生产类型的“知识生产模式2”应运而生。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下,大学不再是唯一的知识生产主体,企业等社会机构也加入到了知识创新的阵营。随着对应用知识、跨学科知识诉求的增加,固守传统学科知识的大学处境艰难。知识生产模式2以情境化、自反性、跨学科性和异质性为特征,超越了原有的学科制度,发展为一种新的范式,使知识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人们,通过各自不同知识生产机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得以产生。^②在现代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知识既高度分化又高度交叉融合的环境下,经济社会发展对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横断学科、综合学科、交叉学科等层出不穷,学科制度危机有不断加速和全面深化的趋势。

对于坚守学术逻辑,而忽视社会需求的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来说,学科制度是一把“双刃剑”。首先,它为学者自由地开展学术研究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也限制了学术自由的进一步发展,使其囿于固定的研究范式和学术共同体;其次,通过学科的集聚效应,它在增强学术组织自治性的同时,也强化

^①王建华:《学科制度化及其改造》,《高校教育管理》2014年第5期。

^②[英]迈克尔·吉本斯等:《知识生产的新模式》,陈洪捷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7页。

了其边界思维和地盘意识,使其逐步走向封闭;再次,学科文化与学科知识的专门化、综合化密切相关,具有封闭性、开放性和多元性相统一的特点。它在促进学科专业化的同时,也造成了学科知识、专业知识与产业知识之间以及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之间的割裂,不利于知识的有序流动。

（二）学科制度制约着基层学术组织发展

客观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而形成的科学知识也必然是相互联系的,具有整体化的特征。只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为了学习和研究的方便,才将知识分门别类,用制度化的形式加以区隔,从而确立了知识的学科化和学科的制度化。然而学科制度不能固化、僵化,不能也不应成为阻碍知识发展和组织创新的理由。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生产关系在学科领域的体现,学科制度危机必将影响到学系、教研室、研究所等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发展,对其组织定位、制度结构、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变革提出迫切要求。在特定语境下,学科制度既可能是院系组织发展的促进因素,也可能是阻碍因素。由于学科组织无法融入到学校整体的学术系统和学科结构,2001年芝加哥大学撤销了教育系,2004年康涅狄格州大学裁撤了地质与地球物理系等。此后“受到学科交叉和综合化的影响,解散地质学系成立交叉学科中心一时成为潮流。”^①从大学组织变革趋势看,过于分化、单一的学科不再是发展的重点。

（三）西方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治理的发展趋势

为应对知识生产模式变迁和学科制度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主动进行去制度化改革,建立了许多跨部门、跨学院、跨学科的横向组织,促使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向开放化、多元化的方向转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学系等传统学术组织之外,创建了大量形式多样、功能多元化的跨学科组织,产生了以大学为主导的跨学科教学研究中心、以政府为主导的大学跨学科实验室、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跨学科研究基地等,有效承担了组织创新的功能。不过,这些跨学科组织只是对学科制度进行局部修补,并没有完全取代传统学科组织,学系仍然是美国大学最主要的大学基层学术组织。

除了重建新部门之外,传统基层学术组织也在积极进行自我改造,在治理体系上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一是促进理念转型。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大学普遍出现了财政危机,加上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盛行,政府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监管力度。一向崇尚自治理念和学术自由等学科导向的传统大学因此受到了冲击,在发展理念上日益呈现出绩效与应用导向。二是实现结构扁平。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大学纷纷减少管理层次,着力改造讲座、研究所、学院和学部等传统学科组织,由三级结构向两级结构转变,出现了扁平化、灵活化发展趋势。三是加强权力制衡。近年来,西方大学开始淡化基层学术权力,探索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互制衡。如美国大学注重基层学术组织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制衡,而德国、法国等则逐渐强化大学层面的行政权力,以此制衡底部沉重的学术权力。四是呈现双向互动。学者素以对学科的忠诚多于对学校的忠诚为傲,享有对基层学术组织的控制权,自下而上的运行机制和治理逻辑一直是主流。近年来,西方大学也开始重视科层机制和市场机制,尝试将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和自上而下的运行机制充分结合起来,体现了组织制度的刚性约束和文化机制的整合作用,有效增强了基层组织的学术治理能力。

^①王占军:《美国大学停办学系的决策过程——以康涅狄格大学关闭地质与地球物理系为例》,《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1年第2期。

四、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治理路径

为打破科层体制的束缚,完善学科制度,应立足于学科理念、学科组织、学科治理和学科文化等,创新我国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提升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运行效率,增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治理能力,最大程度地激活大学学术组织创新活力,努力实现学术自觉、学术自治和学术自律。其中学科理念为引领因素,学科组织结构为支撑因素,学科治理为核心因素,学科文化则起到规范及整合作用。

(一) 以学科理念为引领,明确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治理理念

应注重社会需求导向,坚持学科门类划分理念、学科交叉融合理念,将知识传承、创新与应用充分结合起来,进一步明确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治理理念和价值取向。一方面,学科制度是大学发展的基本组织制度,深刻反映了大学的学术组织特性。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大学作为学术组织追求高深知识和永恒价值的学科理念,以及基于学科制度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并不会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只要高等教育仍然是正规的组织,它就是控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社会机构。它的基本材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各民族中比较深奥的那部分文化的高深思想和有关技能。”^①我们应遵循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坚持学术逻辑和学科门类的划分理念,夯实学科制度的基础,对大学学术组织结构从上到下进行科学设置,提高学科组织化的程度。同时,尽量减少行政权力的非专业性干预,将大学的分类管理与分层管理相结合,推动大学层面的办学类型、发展层次与基层组织的发展定位实现有机融合。另一方面,打破传统过于单一化、封闭化的学科壁垒。坚持社会需求导向,适应外部环境变化,面向学术任务,依托优势特色学科,建立不同层面的产学研中心,通过知识的综合化和横向联系,促进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以及学科、专业和产业链的有序对接,逐步提高基层学术组织的开放性和学术创业活动的应用性。

(二) 以学科结构为支撑,创新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治理结构

着眼职能分离,促使大学组织从三级结构向两级结构转变,形成虚实结合、纵横交叉、多元开放的矩阵结构,竭力避免组织层次、类型之间的功能漂移和目标错位,努力实现大学组织纵向结构的扁平化和横向结构的多样化,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创新型人才培养。我国大学以系或教研室为主的基层教学组织,以研究所、研究中心为主的基层科研组织,以部(处)为主的行政组织,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体现着不同的组织特征。一般来说,研究组织对学术自由和跨学科研究的需求要高于行政组织和教学组织,在组织结构上应有更多的灵活性和多元性。“科研组织应该以项目为中心,往往要求网状结构;教学组织应该按照学科来组织,往往要求块状结构;行政组织往往要求树状结构。”^②建立在传统学科之上的基层学术组织,如基层教学组织和研究所,应以实体为主,有助于探索高深学问;而建立在跨学科之上的基层学术组织,如研究中心、研究院等,应以虚拟非实体为主,有助于开展应用对策研究。

克服学科制度危机,实现基层的变革是一种关键的组织创新形式。然而,这种变革并不是对传统学科制度和学科组织全面否定,而是选择绕开原有的学术组织,另辟蹊径,建立更加包容性的学术组织形式。如“两栖型组织结构”就是这样一种新颖的二维矩阵组织,它能够将学科组织的渐进性创新和跨界组织的突破性创新有机结合,在大学的基层实现组织相对分立、职能相对分离、人员相对融合,

①[美]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页。

②魏小琳:《治理视角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重构》,《教育研究》2016年第11期。

最大限度地规避组织变革的风险。同时“对于打破院系组织结构惰性,加快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推进跨学科研究”^①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国已有不少研究型大学针对基层学术组织结构形式进行了创新性探索。在坚持保留院、系、所等传统学科制的基础上,以跨学科研究中心、实验室、创新团队、学科性公司等为载体,大力探索建设面向实际问题、结构多元、具有高度自主权的“学科特区”,着力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

(三) 以学科治理为核心,优化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治理机制

学科作为一种组织形态,一般是以学系、教研室等大学基层学术组织作为依托。完善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治理机制关键在于“明确学科的学术共同体属性和‘行会式’治理逻辑”,^②这对于纠正大学治理、学院治理代替基层学术组织治理和行政管理代替学术治理的不当做法,维护学者权威、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学科治理主要指的是基层学科组织内部的基本规范和准则体系,它规定了各组成因素的职责权限,包括权力结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应突出学科本位,以学术权力为核心,优化大学内部的权力结构,推动大学从学校层面的横向分权向纵向放权转变。向基层放权,给予基层必要的规划权、人事权、财务权、资源配置权,实现基层学术自治,这是当前解决我国大学学术权力边缘化的一个重要思路。“大学学术权力的大本营不是学术委员会,而是基层学术组织;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矛盾不是校长与学术委员会之间的矛盾,而是学校高层与基层学术组织之间的矛盾。”^③在纵向放权的过程中,应坚持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适度分离、相互制约,使行政权力适度集中,学术权力全面下放,确保行政权力集中于学院,学术权力集中于基层学术组织。实践中,不对权力结构进行合理分类,一味下放权力不利于提高管理效率,也不符合基层学术组织的学科特性。

此外,还要加强基层组织内部学术权力的保障制度和制衡机制建设,进一步推动从学校层面的纵向放权向基层的横向制衡转变。建立健全基层学术组织的学术治理机制,转变学校和学院层面行政管理方式,按照学术的方式实行民主管理。充分调动广大教师参与治学的自觉性,探索形成学术决策、学术执行、学术监督一体化的治理机制。作为以学科治理为基础的基层学术组织,在调动利益相关者平等参与治理的同时,着重强调参与者的民主胜任能力,将尊重学者的学科知识和专业能力视为学科组织治理不可逾越的学术底线。

(四) 以学科文化为灵魂,增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治理能力

文化与制度相互弥补,能填补组织制度留下的空白。组织文化主要体现为学术文化与产业文化、学科文化和跨学科文化。其中学科文化是构成组织文化的核心,是形成学术文化、产业文化和跨学科文化的基础,也是组成院系结构和学科组织的内在因素,具有维护学术秩序的规约功能和整合机制,对于建构基于学科的学术共同体意识,增强组织成员的身份认同感和自律性,弘扬共同体文化具有重要作用。而跨学科文化和产业文化则超越了传统的学科组织结构,有助于克服学科制度危机,通过开展学科互涉和跨学科研究,形成以创新精神为核心、创业文化为载体、学术与产业文化相互融合的文化整合能力。

作为底部沉重、高度分化和低度整合的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文化整合能力具有以层级化为主要特征的科层机制和以资本化为主要特征的市场机制无法比拟的优势,是改造学科制度、实现学术创新、增强治理能力的主要力量。因此,应积极开展组织文化创新,着力培育基层协商民主意识和人际信任关系,构建具有共同思想基础和价值取向的学术共同体,使学术自觉、学术自治和学术自律能最终成

① 文少保:《美国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变迁与运行治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2011年,第73页。

② 谢凌凌、陈金圣:《学科治理:地方高校学科建设的核心议题》,《教育发展研究》2017年第7期。

③ 周光礼:《从管理到治理:大学章程再定位》,《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4年第2期。

为我国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精神标识和文化基因,切实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首先,努力加强制度文化建设,完善学科范式,建立健全学科准入制度、学科划分制度、学科评价制度等。学科制度文化除了正式的治理制度和治理结构以外,还包括树立学术制度权威的意识和对学科制度的遵守,这是增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治理能力的基础。其次,打破行政化的束缚,重视协商民主,培养大学信任文化。通过搭建协商平台,健全协商机制,调动广大师生主动参与学院及学校治理的积极性,这是增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治理能力的关键。再次,努力创建有共同使命、有共同语言、能相互协商的学科文化共同体,凝聚起追求学科卓越发展和特色发展的思想共识,提升学科核心竞争力,这是增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治理能力的落脚点。

综上,从组织制度的角度上说,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是在学科制度化与学科去制度化的相互博弈过程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学科制度是构成现代大学组织制度的基础,学科制度化是促进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形成和发展的动力。而学科去制度化则要求打破传统学科规训制度的束缚,跨越学科组织的边界,努力实现知识传承创新,最大程度地提高大学组织的学术生产力。在知识转型和“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应在兼顾学科逻辑与社会应用逻辑、学科取向与跨学科取向的基础上,着重平衡学科制度化与去制度化的之间的关系,以促进我国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创新,构建更加灵活和开放的学术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更好地服务于知识生产和创新型人才培养。

(责任编辑:蒋永华 石亚兵)

Development Dilemma and Governance Path of Basic-level Academic Organizations in Universities: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

SONG Zhenghui, WANG Yong

Abstract: The basic-level academic organizations in universities are formed and developed in the constant interaction between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deinstitutionalization.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university organizational system, and it is also the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asic-level academic organizations in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great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knowledge areas, the current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 has increasingly presented some problems, restricting the change of the traditional disciplinary organization and bringing about some serious challenges to the organization mode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our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crisis of the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 we should reconstruct and innovate the idea, structure and mechanism for the governance of the basic-level academic organizations from such aspects as the disciplinary concept, structure, system and culture, so as to enhance the capacity of academ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

Key words: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 university basic-level academic organization; governance path;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bout the authors: SONG Zhenghui, PhD in Management,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 WANG Yong is PhD Candidate at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